



镜头背后的故事

——访中央电视台赴四川地震灾区的摄像师

周琨： 亲历垂直救援

摄像记者周琨曾经数次拍摄过地震之后的场景,但他告诉记者:“这次汶川之行,是我最受震撼的一次拍摄经历。”

周琨和同事在12日晚上抵达成都后,第二天就开车来到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,垮塌的教学楼、焦急等待的家长、废墟中随处可见的书包和课本……这些都在向周琨无声地倾述着刚刚发生的那场灾难。“我刚当上父亲,看到这些场景,觉得很心痛。”拍摄了不少救援的场景后,周琨与记者万灵就驻守在都江堰。

14日,他们在外出途中遇到一位战士得知在不远处有一个救援现场。来到现场后,周琨发现这是一座上半部分已经垮塌、下半部分摇摇欲坠的6层楼房,两台挖掘机用挖斗支撑着废墟,使得救援工作得以开展。周琨钻到挖斗下,用镜头记录着救援工作的每一步进展。“现场有一位工程学教授和两位力学博士,他们指挥着救援,先后实施了好几套方案。”白天到夜晚,9个多小时后,废墟中的女孩被救出来了。在一旁守候的女孩的哥哥失声痛哭,他告诉战士们昨天是妹妹的20岁生日。“这时候,不知道谁首先唱了一声‘祝你生日快乐’,救援现场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跟着唱了起来,他们双手交叉在胸前,眼睛里含着泪花。”奇迹发生了,女孩慢慢清醒过来。虽然战士们的声音已经嘶哑,“那是我听过的美丽的歌声……”尽管记者之前已经数次听到这个故事,但是身为亲历者的周琨的讲述依然那么动人。

来到汉旺镇后,周琨在一个幼儿园的废墟旁见到一对中年夫妇,他们在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发现。“他们已经没有泪水了,脸上是一片茫然。”后来有人告诉这对夫妇,一些孩子的遗体已经被运到远处的殡仪馆了,万灵和周琨决定送送这对夫妇。“他们下车时还不忘对我们说谢谢,关上车门后我的眼泪实在是忍不住了。那是我到灾区以后第一次流泪。”

空中救援在此次抗震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周琨也曾经跟踪拍摄垂直营救的全过程。在拍摄中周琨遇到一位获救者,他已经被困10多天了,身上有伤,如果没有空中救援,很可能遭遇不测,因此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。在直升机上往下拍摄,对周琨来说是一个挑战,每一次他都系上安全带,然后将上半身探出机舱,用绑在手上的DV机拍摄。“和那些飞行员相比,我所做的算不上什么。那些飞行员多是执行海上救援任务的,这次救援环境大不一样,距直升机几十米的地方就是悬崖峭壁,有时候还有高压线,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。”

周琨离开北京的时候,他的儿子刚40天。刚到灾区的时候,由于手机信号不好,他一度和家人失去了联系。过了些日子,周琨才陆续收到妻子通过手机发来的儿子的照片。“小家伙一天一个样,挺好的。”周琨的话语中透着浓浓的幸福。据周琨的同事说,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经常在闲暇时拿出手机翻看儿子的照片,以缓解思念之情,但一有任务周琨就马上扛起机器就出发。



刘沙： 责任是第一位的

对于刘沙这个名字记者并不陌生。在采访与刘沙搭档的记者张鸥时,他曾经提到自己和刘沙找了一辆车开往重灾区,途中张鸥实在支持不住睡了一觉,其间刘沙还一直在开车。记者暗自猜测刘沙应该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,海外新闻部副主任王未来的话让记者吃了一惊:“刘沙今年都52岁了,是前方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。”

刘沙是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到灾区。接通他的电话后,那边传来的是低沉浑厚的声音:“刚到灾区的时候,我见到的那一幕幕,这一生都不会抹去。”刘沙年轻时当过兵,海城地震、唐山地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他的战友还曾经去唐山参与过地震的救援工作,即便如此,灾区的景象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冲击。当时刘沙和张鸥急于赶往重灾区,他们面临着车好找但找不到司机的问题,于是刘沙干脆自己当起了司机。“我对那边的道路和路况都不熟悉,来到德阳后,我们找到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干部,请他为我们当

导。”就这样,刘沙开车一路“摸”到了汉旺镇。此后刘沙“一发不可收拾”,频频担任司机:“我单独驾车大概去了4趟都江堰和3趟德阳。”有一次同车的张鸥实在是太困就睡了一会儿,睁开眼睛时他吓了一跳,“因为睡觉前他还在成都,等他醒来发现已经在都江堰了。”

说到开车,刘沙没有过多地提到路上的险情,他对记者讲到了途中遇到的一些孩子:“那些孩子在纸板上写着‘谢谢你们’,或者画上画,每当有车辆经过,就朝着车举起纸板,这让我们特别感动。”深入一些灾区采访时,刘沙一直没有戴口罩。“也许从卫生防疫角度上讲,这样做不太规范,但是我觉得这能够体现对死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尊重,在采访拍摄时人家也相对容易接受。”

在采访的最后,刘沙说:“我觉得责任是第一位的,多做一点事情,就是为灾区多出一份力,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职业。”让刘沙感到安心的是来自家人的支持,“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怎么做过家务,她都习惯了。”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位贤内助的形象。

郭民： 既欣慰又心酸

5月26日,跟随法国医疗队采访拍摄的郭民,遇到了青川6.4级余震;27日,当他来到青川拍摄狮子梁大裂缝的时候,又先后遇到了当地发生的5.4级和5.7级余震。这些让22日就抵达灾区的郭民充分感受到了地震的可怕。

26日拍摄完毕之后,郭民和同事主动要求去青川采访:“在通往青川的路上,我们时常遇到山体滑坡,因为山石都酥软了,司机都挺害怕的。”

到青川后,郭民发现这里的灾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,“90%的房屋都倒塌了,剩下的房屋也都摇摇欲坠。”在青川期间,郭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狮子梁大裂缝,因为它对青川县城构成巨大威胁。“每天都有专家上山监测这条裂缝的变化,我们就想到要跟

访了赶赴灾区的4位中文国际频道的摄像师,他们的讲述令记者想起海外新闻部副主任王未来的那席话:“观众们看到的图像离现场越近,我们的摄像师就越危险,可以说,他们的付出更多!”

踪拍摄。”

上山前,5.4级余震发生了,“脚下摇晃得厉害”。余震平静后,郭民和同事决定继续上山。走到半山腰时,5.7级余震发生了。“这次震感更加强烈,当时我们在裂缝的北山坡,如果余震厉害的话,这里特别容易发生山体滑坡,好在有惊无险。”

在青川县城内,郭民遇到了很多让他难忘的人,“我们遇到一位军医,他俨然是个‘孩子王’,带着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,那些孩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。”

在青川一所中学的废墟上,郭民遇见一位初二女生,经过询问他得知,这个女孩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幸存孩子之一。地震发生后,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同学,于是瞒着父母到学校寻找同学。在郭民的帮助下,这

个女孩找到了3个同学,4个孩子抱在一起喜极而泣,郭民既欣慰又心酸。

在拍摄一些危房时,郭民见到了一支勘测队,他们专门负责评估房屋的损毁情况,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是来自杭州的一位房地产商人。“地震发生后,这位老板扔下自己的生意,带着公司里的专业人员来到青川,无偿为受灾群众勘测房屋。时常有余震袭来,可以说他们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。”

郭民在拍摄期间,还曾坐过一位来自河南的房地产商人的私家车。“他在地震发生后开着自己的车送救援物资到青川,到达后他让司机开着自己的车帮助别人,然后自己为受灾群众当司机,采访时他告诉我们,来到青川后经常边流泪边干活。”

杨小刚： 确保机器没事

这几天,杨小刚和搭档任永蔚一起,成了“飞人”——每天都要乘直升机到北川的唐家山堰塞湖进行采访拍摄。堰塞湖,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,因为有些堰塞湖的水位不断升高,直接威胁到位于其上下游的人民群众,唐家山堰塞湖就是其中最危险的一个,国家已经为排除该堰塞湖的险情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,可谓是一场攻坚战,因此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工作成为新闻媒体的报道热点。

杨小刚和任永蔚搭乘直升机接近唐家山堰塞湖的第一天就起了大雾,直升机根本不能靠近堰塞湖,采访只得作罢。从第二天开始,两个人便在堰塞湖周边拍摄。“那时直升机压根不能完全降落,只有‘一只脚着地’,我们得从直升机上跳下去。螺旋桨刮起的风沙很大,让人睁不开眼睛,更具体的情

况让任老师给你介绍吧。”一旁的任永蔚接过电话告诉记者:“现在唐家山堰塞湖在24小时不间断地挖泄流槽,让洪水能够缓慢下泄。堰塞湖是山体滑坡形成的,湖滩上满是淤泥和树木,路面上是一个个土包,崎岖不平。在上面行走非常艰难,有时候下坡就像滑滑梯。”介绍完堰塞湖的情况,任永蔚向记者说起了杨小刚的敬业:“由于湖滩上有很多断裂的树枝,杨小刚的脚被划伤了,也没法包扎,一直带伤工作。直升机降落时卷起的沙石让我们满面尘土,杨小刚每到这时都特别注意保护好机器。”记者向随后接电话的杨小刚问起这件事,他只是笑着说:“机器没事。”

杨小刚随后向记者讲起自己的汶川之行:“我们快到理县的时候,一路上简直是飞沙走

石,一大片塌方就发生在我们面前,我们等了10多分钟,上前把石头搬开继续走。等到我们从汶川撤离的时候,半路上汽车坏了,而且就坏在一处塌方的附近。后来我们拦住几辆车,司机都非常热心,帮助我们修好了车。就在我们撤离的第二天,汶川下起了大雨,道路又被堵了。”在杨小刚经过小金县的时候,有几位站在路边的乡亲敲他们的车窗,“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就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了。没想到他们一下子递给我们很多食物,有鸡蛋、面包、火腿肠,还对我们说‘你们辛苦了,我们就是尽自己的一点力’。又走了10米左右,路边站满了男女老少,都在给救援的战士、志愿者还有我们送饭。那一刻,我更加深刻地觉得再危险、再辛苦也不算什么!”